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 中国军事战略思维论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

李际均 著

China's  
Military Strategic Thinking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国军事战略思维论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

李际均 著

China's  
Military Strategic Thinking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战略思维论 / 李际均著. — 北京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00-0357-2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军事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E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3452 号

中国军事战略思维论

ZHONGGUO JUNSHI ZHANLÜE SIWEI LUN

李际均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30.5 印张

2017 年9月第1版 2018 年10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5300-0357-2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李际均

---

193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后定居长春。1950年入伍，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39军司令部侦察参谋、军事科学院学术调查研究处处长、第24军71师师长、第38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选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兼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防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战略学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论战略》《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中国军事思想传统与防御战略》《军事科研思考与学术对话》等。

主编图书：《中国军事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 代序

## 领略军事战略研究的思想境界

——读李际均《中国军事战略思维论》感言

《中国军事战略思维论》是李际均中将的一部力作。李将军作为战略思维与战略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在书中以此为视角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这本书中涉猎的军事学术门类相当广泛：从军事哲学到军事辩证法，从战略思维到战略文化，从战争历史到战略遗产，从地缘政治到联盟战略，从战争动因到维护国家主权，从新军事革命到国际战略控制，从军事斗争准备到祖国统一大业，从强边固防到经略海洋，从战争计划到战略战役主动权，从古代单兵战术到当代高科技战争等一系列军事战略问题，给读者以丰富的精神营养、学术启迪和爱国主义教育。

书以载道，文如其人。一个人的著作就是他的心声，反映其历练、教养、风骨和情操。作为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战火考验并且在战争中入党的老兵，李将军不仅清正廉洁，更以其不老的军事理论追求，让我们看到了用血汗凝成的文字背后的底蕴、激情、忠诚与战略智慧。

### 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作者用他一辈子的思考告诉大家，什么是其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只有至诚才能传递出至真，因为至真，才让我们有幸仰视前辈毕生擎举的理想之光，如此纯粹，如此炫目。细读这部作品，字里行间无不深切感到作者对祖

国那份执着的责任、挚爱与忠诚，而且这份情愫任岁月流逝、地位变化，从未有过丝毫动摇。爱国爱军、强国兴邦、知兵谋胜，始终是他从事战略思维研究的原动力。对此，他曾深情地吐露过自己的心声：“不寻常的年代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有一种无法磨灭的爱国激情。”的确，老一辈人是带着英雄时代的体温和热血一路走过来的。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今天是以先烈的血泪洗面才得以容光焕发……我庆幸自己是中国人，并且生活和成长在充满激荡、艰辛和进行伟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作为投身革命事业的后来者，赶上参加开国第一战，从少年到白头，保卫祖国就成为自己人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他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军人，怀着强国兴邦的夙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在这个不少人质疑一切、刻意回避崇高的年代，为什么这些话能如此直击人们的心灵？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一个职业军人和优秀学者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用于为祖国服务的时候，那么一个昂首挺立的、大写的军人就会伫立我们的面前。

作者强调爱国主义是历史的永恒主题，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信仰、第一人格。他认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是战略思维的根本点，而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不受侵犯则是战略的首要问题。

面对国内传统文化断脉、当代文化扭曲、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以及“告别革命”“去英雄化”等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作者警告说：“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永远不能分割的。如果一个民族缺乏气节和道德戒律，缺乏对民族抗敌历史的尊重、对国家耻辱的铭记、对死难同胞的悲悯、对革命志士的缅怀，那是没有希望的。”他坚信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经数千载沧桑，中华民族的认同始终如一。谋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社会心理、道德观念、民族感情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对于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的态度是战略家乃至普通公民的

政治品质的底线。

2009年11月，应我国台湾地区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邀请，作者参加了“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说，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比养50万大军还管用”，并强调，大陆的导弹不是威胁，“台独”才是威胁。他呼吁两岸共同协防南沙，维护南海、东海主权。他说：“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是大势所趋。基于中华民族大义，相信有着黄埔精神传统的台湾军人不会为‘台独’而战。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两岸军人同属中国军人，不应该兵戎相见，而应该共同负起捍卫中华民族固有的领土主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使命。”他的话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作者早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在战争期间入党。抗美援朝战争以其光荣、惨烈、艰苦而载于史册。作者指出，它不仅是“两种哲学、两种智慧、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而且是“一座伟大的熔炉，是攸关天下兴亡，锻铸民族之魂，考验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和生存能力，特别是国家领导者战略智慧、胆识与魄力”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创造了步兵进攻穿插作战速度的奇迹，也创造了战胜极度艰难困苦、英勇顽强的极限。书中写道：“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甘岭站立着。”有人公正地评价说，一百年里第一次为中国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些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我们今天仍然享受着他们给我们的恩惠。

1997年7月，作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应邀率团访美。启程之前，《华盛顿邮报》发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前首席顾问威廉·特里普利（W. Triplett）的文章，其中说作者“有同美军作战的经历”，“1989年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如果亚伯拉罕（S. Abraham）参议员的制裁中国法案还有效的话，李将军就不能得到进入美国的签证”。对此，作者在美国陆军学院演讲结束时回应说：“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朝鲜

战场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谁敌视中国，谁就会给自己制造 12 亿个敌人，并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走出战壕便是和平之路，对于军人来说，用酒杯瞄准比用枪炮瞄准好。”最后这句话，成为世界军事外交宴会上的名言。作者的演讲得到了美国军方的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战略专家之一”。

## 二、深刻的国际战略观察与对策研究

作者在书中指出，超级大国引导的新军事革命不会使发达国家更安全，反而会使世界更不安全。掌握高科技能力的国家，必须从全球安全出发，避免科学技术力量无限制地向战争力量异化，否则必将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失去理性，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变成毁灭文明的力量，改造世界的的能力有多大，破坏世界的的能力就有多大。他指出，霸权主义就是放大的恐怖主义，没有道德的政治就是压迫，没有道德的军事就是屠杀，没有道德的经济就是掠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战争运动走向正义战争的反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接连上演，目前它还在寻找新的战争目标。作者当时就指出，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并且预言，“伊拉克战争会变为取胜最快、打扫战场最慢的战争”。这些预言后来都成了事实。

作者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批评自诩为“战争总统”的小布什时说，全世界都应该认同在绝对的军事力量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原则，否则，全球化就会是霸权化，“新战略”就会成为新战争，“世界新秩序”就会变成世界无秩序，“高技术、零伤亡”的反恐战争就会成为强权国家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的杀戮。他进一步指出，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战法的出现才



算是新军事革命的完整表达，其中就包括非对称战略：在作战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哪里怕打，我专打你哪里。在装备发展上，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你怕什么，我发展什么。几句话道出了非对称战略的实质。

作者指出，帝国主义统治世界两个世纪造成的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式、霸权情结、扩张惯性，妨碍了其重新思考与认识当今世界的的能力。须知，谁也没有给西方大国赋予垄断人类价值观的权力，更没有授予它们任意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力。剥夺别的民族自由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侵害别国安全的国家是不安全的，维护自身安全的保证是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利。

### 三、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严谨的思维逻辑

作者认为，军事战略思维是带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战略思考。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它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起自学术，终及国家”的大问题。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时，作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统领全书，做到了其思想的逻辑统一性。

作者强调军事研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观念到观念的经院式推导，不是用规律自身说明规律，军事理论之花不能脱离战争实践的土壤。军事学术研究的任务是把军事实践上升为理性认识又反过来指导军事实践。他对《易经》“师左次，无咎”的考证表明这个原则最初是由冷兵器时代单兵战术演化而来的，而且直到现代的坑道战、巷战仍然适用。只有具备实战经验的人才能做出这样专业的解读。

作者充分利用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参加部队演习获得的直接经验，加上研究古今中外战争的间接经验，进行新的学术探索。1983年，时任71师师长的作者在当时权威的《红旗》杂志和《哲学研究》杂志上分别发表了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论》，这两篇论文当年同时获得优秀论文奖，这在包括当时中国理论大家在内的研究者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作者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维的特点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例如，毛泽东确立了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战争指导的逻辑程序，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的循环反复，不断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研究作战部署必须立足于能够对付出现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战略上有规则有定向、战术上无规则无定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者认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思维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最高表现，它是当代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原点和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荣誉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担任“万岁军”（即第38集团军——编者注）军长，而中国陆军的改革与转型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当时该军受领机械化集团军试点任务。作者在书中概括了组建机械化集团军从论证到实施的经过。他写道：“单凭直觉经验无法形成对各个组成部分和总体作战能力的认识，只有对构成集团军作战能力的诸要素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和论证，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任务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战法研究。通过研究论证，可以加强合成意识，重视兵种建设和使用；可以为优化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结构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能有效地提高指挥员和机关的军事素质。”他组织机关和部队对上述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然后指挥机械化集团军开展了大规模的实兵对抗演习。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书写了“勇于改革，善于创新，面向未来，建设新军”的条幅送给作者。

#### 四、战略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作者写道：“文化是战略之母，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战略文

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大战之后，便是文化使命的展开。因此，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同等重要。中华文明赋予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他同时指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也有消极的成分，如重文抑武、重道轻器、退让自保、消极防御等。因此，对传统的东西要进行提纯。

作者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俄国的《彼得大帝遗嘱》、德国的《德皇雄图秘著》以及日本的《宇内混同秘策》《田中奏折》的历史延续性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以及战略制定者的思维方式和战略思想形成的发展脉络。战争狂人的战争计划无不与其本民族侵略扩张的战略文化和历史相连。因此，他认为：“过去犯过侵略战争罪行和战略错误的国家要真正接受历史的教训，进行战略上的自省与自律，才能保证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他指出，世界向民主化发展首先是国家关系的平等化，只有“尊重所有国家和民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应有的气质、风度和历史责任”。像日本这样有过侵略罪行而又不会反思认错的国家是没有政策免疫力的，如果它不改弦易辙，终究是人类的祸患。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和古为今用的历史纵深是作者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纵向坐标，而当今世界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以及中国的国防安全所面对的现实威胁与安全需求是他的战略思维的横向视野。他认为，研究与发展军事理论特别是研究外军的军事理论，重要的不是诠释对手，而是如何战胜对手。在信息化时代，全面的整体战争才真正降临，战争已无平时与战时之分，核威慑下的和平、军备竞赛、局部冲突以及政治战、经济战、军事战、文化战、舆论战、心理战等都在全时空地进行着。作者指出：“面对国际局势和安全威胁，我们的主动地位是建立在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情况下的抓住机遇，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定规模的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来遏制战争，立足于具备武

力统一能力条件下的和平统一，立足于尽早做好准备的耐心等待。……中国领土主权和统一大业一旦受到威胁，外国是否介入以及介入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外国的政策，更取决于我国军事斗争准备的程度和反击决心与手段的有效性。”这正是辩证思维与战略对策的科学表述。他总结战争经验得出深刻的结论，那就是：“必须提高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和部队的训练水平，否则战时就会无谓牺牲生命和用鲜血来弥补指挥与训练的不足，那才是不仁之至的事。”这就是从古到今不变的为将之道。

### 五、不老的军事学术追求与信仰的坚持

在图书装帧越来越考究的今天，作者的几部著作都以其简朴的装帧和厚重的内容走进人们的视野。有的书读起来是由厚到薄，而他的书读起来却是由薄到厚。一贯喜欢浏览群书的我们，读他的书却快不起来，只能老老实实地逐行推进。作者以简约的文字功底、敏锐的战略思维、深邃的军事历史哲学把战争实践与军事理论诠释得深刻而生动。

作者强调：“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他的著作讲的就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认识论与方法论。他提出，要坚持“以国防为主导的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的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他指出：“每当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和大变革的时代，便是呼唤和产生大战略思维的时代。如今面临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敌视、干扰、围堵甚至威胁时，在战略举措上如果只做出对手预测评估内的反应，或者降低目标，就会丧失主动地位。驾驭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维护并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对战略能力的考验。”他提醒人们“避免把现象看作本质，把策略当成政策，把战略手段当成战略目的。韬光养晦是策略，有所作为是战略；和谐世界是愿景，针锋相对是现实”。

经历过战争的血与火，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严酷，同时更强调保卫祖国的义无反顾的责任。他追求的是慎战、备战、敢战和以战止战、能战方能言和的战略境界。他把对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军事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作为穷其一生不懈努力的目标。将军傲骨里有无声的强音，是具有伟大献身精神的血性军人。当今中国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

宋志强、于淑杰、刘丽群<sup>①</sup>

2017年1月定稿

---

<sup>①</sup> 宋志强，中央军委办公厅原副局长；于淑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刘丽群，《解放军报》记者。

# 自序

军事战略思维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求索与解决。早熟的战争与晚熟的和平贯串了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文明史，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为超越自身而迈出的每一步足印。由对立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技术力量剧烈碰撞而激起的战争浪涛，能够推动社会历史的航船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时代精英，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生命牺牲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应让它像沙滩一般浪过无痕。要让用生命和鲜血写在天幕和大地上的历史留下来，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后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事后认识的浅显道理在当时的实践中却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历史是反思，哲学是对反思的反思。如果事后仍然没有上升为理性认识，那么未来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专家学者都在寻找不知芳踪何处的和平世界，各国的思想者也忙着给新时代下各种定义。从军事角度遥望未来的国际安全形势，在隐约可以看清的轮廓后面，是浓云重盖下的许多不确定因素：进入21世纪之初，超级大国就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四面出击、一意孤行，推行单边利己主义的国际政策；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日本虽然没有产生过让人信服的世界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但却总是不乏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右翼政客；一位被称作患了“政治狂犬病”的日本高层官员，怀着仇视中国的心理，断言“中国必将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热切期待着中国的崩溃”。事情就是这样严重：人类一个世纪的战争苦难和劫后余生的智慧，既没有感动也没有教会怀有野心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懂得在何处止步。石油柔似棉，核

弹亮如金，都沉默地等待着玩火者。中国人民既然已经看透了西方大国“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掌”的真面目，就不得不认真思考并切实准备如何对付更严峻、更富挑战性的未来。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又一次全面发展，而且意味着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生存智慧上的竞争更趋激烈。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思维，这是一种伟大而又危险的思维：创造文明或毁灭文明、正义或邪恶、社会进步或倒退，都取决于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冷战后，超级大国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及一连串的“颜色革命”中受到激励，强化了以武力与和平演变两手图谋霸业的观念。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文件中说：“也许现代战争的一条经验，就是战争再也不能被称为战争，而美国无须取得任何明确的一致意见或正式的法律授权，就可以稀里糊涂地卷入战争，稀里糊涂地打完战争，稀里糊涂地退出战争。”<sup>①</sup>简而言之，就是美国想打就打，想打谁就打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其实那几场战争都是以技术的高超和道德的低下而载入史册的，其消极后果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酵。

在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战略、战术与技术的界限可以轻易跨越。美国B-2轰炸机从本土起飞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战略级的决策、战术级的行动。同样，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在抵抗侵略时，如果能造成对方难以承受的伤亡或指挥系统的瘫痪，其作战手段可能是战术性和技术性的，而其作用和影响则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既然战略与战术、技术的门槛能够如此轻易迈过，决策艺术就更要知彼知己、慎之又慎。

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需要清醒地明确自己根本的战略利益和稳定的安全因素之所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的战略制

---

<sup>①</sup>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索沃航空兵与导弹战役的经验教训》，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定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的范围，而是国家的综合安全战略，包括国家利益范围、地缘战略边界和综合国力在国际范围的运用等，其内涵扩展到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与资源安全、科技与文化安全等。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必须抓紧发展自己必备的高技术武器装备，还要创造出以等效威慑手段为后盾的不对称作战理论与战法，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 二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从建军伊始，我军就是在敌强我弱、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奋斗过来的，其中最突出的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东北抗日联军等，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当时，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说：“联合国（军）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中华民族经过这场战争迎来了又一次历史的辉煌。

不寻常的年代是历史的浓缩版，聚集着亿万人民创造的翻天覆地的伟业。同时，它又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经过那个时代历练的人，都会有一种无法磨灭的爱国激情。回望 60 多年前烽火未熄的 1950 年，那是新中国开国以后最复杂、最艰难的第一个年头，但也是比历史上所有社会巨变都更耀眼的年份。且不说新生的共和国面对包围和封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复杂斗争，单是军事上的大事就是和平年代几十年都难以遇到的，而那个年代则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顽强的生存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特别是显示出了国家领导者的战略智慧、胆识与魄力。毛泽东在 1950 年亲自起草的指挥军事斗争的近 300 份电文中，就包括：建设海军和空军；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准备登陆台湾作战；建立东北边防军，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突变；指导中国军事顾问团和越南人民军围歼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布置闽浙和桂粤湘剿匪；进军



新疆；巩固华东防务，准备对付美蒋可能的登陆进犯；部署昌都战役和进军西藏（此时美国正阴谋策动“西藏独立”<sup>①</sup>）；特别是果断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直接指挥决定朝鲜战局、把以美国为首的16国侵略军赶回“三八线”的震惊世界的战争行动。这些大事，每一件都是一部鲜活的史诗，都够得上立一座丰碑。

每当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和大变革的时代，便是呼唤和产生大战略思维的时代。如今面对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敌视、干扰、围堵甚至威胁时，如果我们在战略思维与举措上只能做出它们预测评估内的反应，或者降低目标，那么就会丧失主动地位。驾驭这样复杂的战略环境，维护并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对战略能力的考验。在扑朔迷离的国际斗争中，迷失方向的军事理论比没有理论更危险，例如对中国安全威胁的判断是“非国家行为体、非武装集团、非战争行动样式”<sup>②</sup>，显然是一种误导。不能把相对和平状态固定化，排除国家利益冲突激化的可能性，更不能淡化我国领土、岛礁被侵占和蚕食的现实，特别是不能无视霸权主义及其追随者敌视中国的一系列举措，企图以武力侵犯中国领土，阻挠中国统一的严重性。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绝不可以弱化对传统安全威胁的防范，避免主次颠倒，误导军队建设，转移军队根本职能和涣散战斗意志。

军事理论的探索永远是未完成的。军事斗争的客观逻辑决定本书内容的主观逻辑，即通过对军事历史和战争现象的研究，试图揭示其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形成军事哲学、战略思维、战略文化、战略遗产、战争动因、军事变革、战略控制等概念及其内容。把以往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研究不是出于兴趣和为了获得一种发现的快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军人，怀着强国的夙愿，参与我们饱经忧患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沉思。

① 梅·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第2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章。

② 《中央中央党校报告选》，2010年第2期。